

#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与孙学峰同志商榷

王 义 桅

拙文《在科学与艺术之间》受到批评和关注是件非常高兴的事。我只是引出了一个重要话题,即在引介、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这么多年后,如何跳出其思维范式,以批判的方式表明我们的立场,给出我们的说法,如何创新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等等,是不折不扣的抛砖引玉。

首先,我要说“悟”出来的文章是不能以“写”出来的思路去读的。此文即是我学习、研究国际关系理论近些年来“悟”出来的结果,深知“大胆假设”有余而“小心求证”不足,更给人以有“破”无“立”的感觉。实际上,此文的下半部分《比较国际关系学与中国学派的兴起》发表在2002年第5期《开放时代》上(新华文摘2003年第2期全文转载)。

非常奇怪的是,这两部分内容我已于2002年12月16日在伦敦经济学院参加英国国际研究协会(BISA)年会时加以阐述,副标题用的即是The End of American @IRT.com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IRT.com。英国学派的领袖Barry Buzan教授在对我的文章作评论时,称“受到触动”;与会者也并未得出“学术批评不同于道义谴责”的结论,而是总体上认同了我的想法。偏偏是中国学者不能接受我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见孙学峰《学术批判不同于道义谴责》,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以下简称《批判》一文),希望我不违背“革国际关系理论命”的基本前提。颇有些纳闷,如果不违背资产阶级学术的基本前提,如何产生《资本论》?

《批判》一文首先对学术批判下了体制内改良式的定义:“学术批判是指对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学理性分析和评价,即从学理上总结已有成果的长处并分析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以便为今后的研究奠定更完善的学理基础,并非仅仅意味着要全面否定已有的成果。”

先说说学术批判。我想学术批判至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革命性的,超越思维范式;一种是改良式的,在体制内进行。纵观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历程,往往是前者匮乏而后者有余,通常以论战代替革命,所谓批评理论既不占主流又有被建构主义同化之势,这不得不说是国际关系理论演绎的悲哀。孙学峰同志一开始就亮出了要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术共同体”一员的身份,与我的争论也就自然的了。

再说我对“否定”一词的理解。我并非全面否定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而是试图发掘其本质,从未否认其对于维护西方国际体系的合法性和作为学科进步的重要意义,而只是说产生于西方国际体系下、以西方国际关系史为依托、以西方观念和话语为载体的国际关系理论不是普适性科学,而具有艺术纬度所反映的多元化特征——不同的国际体系应该产生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应该是多元的世界,只可惜是西方内部的多元,非西方世界主动放弃追求真正多元化的使命并否认这种努力的意义。因此,东方(南方等)国际体系下应该有自身特色而有别于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但是,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作为强者的产物,抹杀不同国际体系的事实,试图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普适

发展和对外战略实施提供决策咨询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这次会议所彰显出来的理论研究与决策研究相互依赖,是一个可喜的进步。

(作者系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收稿日期:2003-01-31]

[责任编辑:邵 峰]

化,发展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所指出的“如果你不能表达自己,必将被别人所表达”。Barry Buzan 教授告诉我,在他任 BISA 主席期间,美国的国际研究协会 (ISA) 很不高兴,劝说英国不要闹分裂,ISA 已是全球性的了,没有必要另起炉灶。

萨缪尔森在《经济学》教材中指出,“不能说经济学是一门精致的科学,毋宁说它是一门艺术”。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国际关系理论更是这样,研究西方古希腊的理性传统与古罗马的法的精神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观念塑造是个很好的课题。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成为美国话语霸权的表现,正在试图普适化,阻碍了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与革命,恰如美国外交中“美国例外论”与“天定命运论”两大理念产生出的种种矛盾——美国试图将其独特的价值观念与社会制度推广至全球,是自相矛盾的行为。

再有就是《批判》一文担心的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贬为“种种庸俗国际关系理论”,“那么后来人超越这些理论可资借鉴的经验和赖以存在的基础在哪里?”在去欧洲访问前,我也有类似的担心。在巴黎政治大学访问期间,拜访了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 (EHESS) 裴天士教授,他提醒我美国的方法论是有问题的:先谈研究主题,然后回顾已有的研究成果、理论范式,确立自己的分析框架,推翻、补充或验证某一观点或理论,容易为既有观念和理论范式影响而取舍事实;实际上应该从问题入手,看看这一问题在世界上的联系,与之相关的种种矛盾,尝试去理清、解决这些矛盾,再看看已有理论成果,借助或批判已有理论,进而创新理论,最终是为解决问题。这使我茅塞顿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要返璞归真!因此,我们超越前人理论的基础不是已有理论大厦本身,而是生动活泼的社会实践!从理论到理论,是没有前途的。真可谓“真理是灰色的,生活之树长青”。

因此,我没有按西方的逻辑套路去批判它,而是试图超越,力求表明国际关系理论大厦应该尊重和充分反映国际关系体系多元化演绎的历史与现状。如果按照《批判》一文要求“清楚地介绍批判对象的概念界定、变量关系、逻辑推断就成为学术批判必不可少的前提”,只能是再次被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话语与范式同化而“不识庐山真面目”了。

拙文试图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各方面展开批判,但实际上方法论批判显然不足,感谢《批判》一文适时提醒我“学术批判要有理有据”。但是,所举例子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对“国际关系理论是阶级理论”的反驳,认为地缘政治理论也为苏联组建华沙条约组织利用,故而不存在阶级性。其实,马克思理论也为资产阶级用来搞社会福利、市场经济计划化,但谁都不能否认马克思理论的无产阶级性。再比如对“成吉思汗帝国疆界远大于罗马帝国”的批驳。历史上,疆界大小当然是衡量帝国强盛的标志。“成吉思汗帝国疆界远大于罗马帝国”就表明成吉思汗帝国比罗马帝国强盛,因此“美国是罗马帝国以来最强大的国家”就是无视历史事实的逻辑错误——至少以前成吉思汗帝国曾经比罗马帝国强大。又比如,我举《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所引“身份和认同”例子,《批判》一文认为这恰恰验证了现实主义的逻辑推断——“身份和认同的确定,是由国家的战略利益直接推动的”。如果是这样,建构主义似乎应附属于现实主义而存在,原生性身份与认同问题是不能通过现实主义解释的,这正是我诘难建构主义的原因。其余批评不一而足。

当然,我并不否认国际关系理论中许多作为人类思维共性的成就(原文也无意去全面梳理已有国际关系理论之优劣),问题是我们要善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而非简单的批判,毕竟“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最后,再次感谢孙学峰同志的批评。希望以此为鞭策,在即将于3月1日参加国际研究协会 (ISA) 波特兰年会上宣读论文“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与中国学派的兴起”时更好地阐述我的想法,倾听西方学者的反馈。

我深知,经过这么多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熏陶,我们要么被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同化,沉浸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预设的理论王国之中而自得其乐,要么对新论百出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万花筒应接不暇,要“自拔”需要一个过程,我只是发出了也许并非第一声的呐喊——成为你自己!

(作者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讲师、博士)

[收稿日期:2003-02-06]

[责任编辑:邵峰]